

不征之國的破滅——

《野叟曝言》、豐臣秀吉與「渡海之戰」在小說之實現*

曾世豪**

摘要

康、乾時人夏敬渠之作《野叟曝言》，以「托於有明」的策略模糊虛、實，寫出中國軍隊橫渡海洋，生擒木秀（豐臣秀吉），直搗日本東京港的想像，布局可謂大膽。夏敬渠筆下的日本在木秀、寬吉夫婦統治之下，篤信佛教，荒淫無度，因此渡海之戰象徵的首先是「正統／異端」的對抗，這場戰役可以說是「宗教的戰爭」。其次，明軍與倭兵決勝之地點，從飽受倭患蹂躪的東南沿海或朝鮮，轉移到了臺灣，當是受到康熙平臺的啟發；小說言日本收入中國版圖後「洵東瀛之雄鎮，而遼海之屏藩也」，也與施琅主張臺灣沿海「左護」的地理價值有關。此外，儘管洪武曾宣稱日本為「不征之國」，興兵不祥，採取保守、自衛的海洋戰略，但實際上洪武、萬曆都曾萌生過征倭搗巢的構想，只不過基於現實考量與外交方針，最終未能付諸實現。職是，《野叟曝言》中的情節看似荒誕不羈，卻非全屬杜撰，作者乃是於說部之中，做足了天子及讀書人未竟的大夢。

關鍵詞：不征之國、《野叟曝言》、豐臣秀吉、佛教、臺灣

2017年6月1日收稿，2018年4月27日修訂完成，2018年10月17日通過刊登。

* 初稿曾受高桂惠、楊明璋兩位指導教授點撥，並宣讀於「東亞文化交涉學會·第9屆國際學術大會『全球史觀與東亞的知識遷移』」（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会／北京外國語大學主辦，2017年5月13-14日），會中承蒙藍日昌老師賜教，獲益良多，僅此申謝。

** 作者係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

一、前 言

十六世紀，豐臣秀吉（1537-1598）為實現「一超直入大明國」之雄圖，發動萬曆朝鮮戰爭（Japanese invasions of Korea, 1592-1598），¹造成「自倭亂朝鮮七載，喪師數十萬，糜餉數百萬，中朝與屬國迄無勝算，至關白死而禍始息」²的毀滅，是一件影響東亞的大事件，也因此成為文人騷客感興趣的題材，說部之中亦可見「關白」之蹤跡。³就筆者管見，在明、清小說中，有若干作品出現了與豐臣秀吉相關的情節，包括〈斬蛟記〉、〈杜十娘怒沉百寶箱〉、〈曲雲仙 力戡大盜 義折狂且〉、《西湖小史》、〈查氏女〉等，但篇幅較鉅的文本則是以「才學小說」聞名的《野叟曝言》。⁴《野叟曝言》為康、乾（1661-1795）時人夏敬渠（1705-1787）之作，全書長達 154 回，文本中的主人翁：文白（字素臣），

-
- 1 萬曆朝鮮戰爭指的是 1592-1598 年發生在朝鮮半島的東亞區域性戰爭，日本方面稱為「文祿・慶長の役」、韓國方面稱為「임진왜란」（壬辰倭亂）、「정유재란」（丁酉再亂）。相關研究可參鄭樑生，《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幾個問題為中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5）；（日）中村榮孝，《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中冊（東京：吉川弘文館，1970）；（韓）崔官著，金錦善、魏大海譯，《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等。
 - 2 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320〈朝鮮傳〉，頁 8299。
 - 3 學界較早注意到相關題材的，為（日）青木正兒，〈支那戲曲小説中の豊臣秀吉〉，載於氏著，《江南春》（東京：平凡社，1988），頁 115-125。
 - 4 本文使用版本為清·夏敬渠著，黃坤校注，《野叟曝言》（臺北：三民書局，2005），154 回本。以下為行文方便，所引原文但標回數、頁碼，不另加註。筆者按：《野叟曝言》現存版本主要為木刻活字本（光緒辛巳毘陵彙珍樓新刊活字本，歐陽健稱為甲本，1881）、石印本（光緒壬午申報館排印本，歐陽健稱為乙本，1882）與珍藏本（臺灣世界書局珍藏版，1957）。木刻活字本為 20 卷 152 回，石印本為 20 卷 154 回。珍藏本亦為 154 回，是刪去穢褻與評注的「淨本」。石印本雖係晚出，且較木刻活字本多出 2 回，但王瓊玲與歐陽健皆認為此為原作之副本，而非後人增補，足以參考，是以筆者在此使用版本為以木刻活字本為底本，輔以石印本補正之全本（同時亦保留評點）。有關《野叟曝言》的版本問題，詳見王瓊玲，「野叟曝言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6），頁 9-21；歐陽健，〈《野叟曝言》版本辨析〉，收入蕭相愷等選編，《夏敬渠與屠紳研究論文選萃》（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 41-58。

「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止崇正學，不信異端」，堪可視為小說創作者生活閱歷與理想人生之投射。⁵

這部小說的視野相當龐大、複雜，除了披露「醫、兵、詩、算」的四大才學，以及型塑主角忠君孝母的完美人格、多子多孫的旺盛生殖力以外，單就文白的戎馬生涯來看，其足跡也踏遍大江南北，並達成「征苗、衛宮、誅藩、救劫、迎鑾、靖虜、平浙、勦倭」的「八案首功」，被天子尊為「素父」。最終在文白及其子嗣、奴僕、友人鞭撻寰宇，闢除佛、老的壯業中，服膺於大明王化的國度橫跨歐亞大陸，東自日本，西迄歐羅巴洲，其功勳實在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就上所述，在《野叟曝言》觸及的異國形象十分遼闊，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展現出許多別開生面的想像，尤其豐臣秀吉被目為是一位淫惡的蠻王（小說作「木秀」）、中國軍隊越過汪洋大浪，直搗倭國東京港的所向披靡，皆展現出小說家天馬行空的想像力，值得探討。而必須說明的是，本文所根據版本為 154 回本，與最早注意到相關情節的青木正兒不同，其使用版本疑為 152 回本。不同版本於征日敘述的差異，主要在 154 回本中的 134 回〈泰運將開囊括扶桑日本，疑胎乍脫血凝鐵丐銀兒〉，在 152 回本作 132 回，然僅有目而無文。是以青木正兒在討論「支那戲曲小說中の豊臣秀吉」時就闕漏了若干重要的情節，所援引之回目亦有所參差，也是筆者認為可以補充之處。⁶

具體來看，在小說中，日本在木秀、寬吉夫婦的統治之下，成為一崇奉異端的國度，並對中國的正統地位進行挑戰，因之這場戰役在本質上是「正統 / 異端」之間的碰撞；而明、倭兩軍決勝的地點被安排在臺灣，並將納入中國版圖的日本目為是「洵東瀛之雄鎮，而遼海之屏藩也」，

5 魯迅提到，「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載於氏著，《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頁 172。又王瓊玲考證作者生平及著作，認為這部小說是夏敬渠以個人才學、真實歷練、生平理想、夢想與幻想，並融合夏氏宗族多人的多項事跡改寫而成，故摻雜著濃厚的「私傳」與「家傳」色彩。載於氏著，《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 1-4。

6 又因 154 回本較 152 回本多插入 3、4 兩回，後面皆依次順移，因此回數上也略有出入。青木正兒稱其以 116、129、130 回為材料（然查 152 回本，相應情節則為 117、130、131 回），其實在 154 回的石印本對應的當是 119、132、133 回。

帶有作者所經歷的時代特色，也就是受到施琅平臺（1683）及清廷將臺灣視作沿海各省「左護」的啓迪。最後，小說跨海搗擊日本的描寫，與明朝視之為「不征之國」的國策，看起來有相當大的扞格，那麼小說中的描寫，是否純屬虛構？也是需要釐清的問題。本文在此即針對《野叟曝言》中的豐臣秀吉與渡海之戰，提出一些看法，以下首先就書中豐臣秀吉之形象的刻畫進行介紹。

二、豐臣秀吉：荒淫膾穢，舉國若狂的異端信徒

基本上，《野叟曝言》的時間座標處在成化（1465-1487）、弘治（1488-1505）兩朝，然而作者為烘襯文白在明孝宗時的得君行道之久，遂把正史中僅十八年的弘治拉長為三十三年，⁷並在書中穿插明代許多王公將相的豐功偉業，統歸為文白一人的曠世勳業。⁸這種「托於有明」的敘事謀略，猶如楊旺生所述的，雖然成功地將成化、正德的昏瞶荒淫與弘治的勤政賢明提出鮮明的對比，突顯了作品的史鑑用意，卻又不是要追求與正史的切合，而是一方面顯示作品非「虛而無徵」；另一方面，又努力拉開作品與正史的距離，不僅變史事，更在每一關合正史的情節內容中，加進虛構甚至荒誕的內容。⁹

職是，《野叟曝言》在描述日本進犯中國的相關情節時，亦游走於「虛／實」之間，展現與史乘若即若離的關係。小說較早提到日本的不軌

7 錢靜方，〈野叟曝言考〉：「蓋作者欲言文素臣得君之久，而孝宗在位，不過十有八年，凡所設施，未能暢透；乃截憲宗成化十年以後，為太子監國之年，而下移武宗之年，歸并弘治，而終於三十三年，以弘治十八年孝宗上賓，改寫天子病愈改元厭哭一事，隱成正史之實在。」載於氏著，《小說叢考》（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1979），頁 162。

8 包括王守仁（撫平貴州蠻夷，招安贛、漳諸盜，削平寧王宸濠之亂）、韓雍、廷瓚、歐磐、武清（破大藤峽、平田州亂）、王越、許寧、周玉（剿平紅鹽池）、萬安（招撫囊罕弄）、王軾（擒滅米魯）、戚繼光、俞大猷、胡宗憲（平倭寇）等功績，都被歸諸於文白之下。詳見王瓊玲，「野叟曝言研究」，頁 58-66。

9 楊旺生，〈論《野叟曝言》「托於有明」的敘事謀略〉，《東方論壇》，2001.1: 83。

之志，是在 65 回文白渡海至臺灣，從靳仁家中伙計袁作忠（方有仁）口中得知，「他從前蓄養亡命，結連倭夷，上自遼東，下至廈門一帶海洋，大半打他旗號，聽他使令」（頁 1205），顯示了靳仁與日本的暗通款曲。靳仁是靳直的姪子，而「太監靳直，即汪直、劉瑾也」。¹⁰汪直、劉瑾分別是成化、正德時的閹奸，在文本中則被合成一個人；但其中汪直又與「嘉靖大倭寇」時叱吒東亞水域的「五峰船主」汪直（王直）名、姓吻合，小說作者可能是因此而將「閹黨」與「倭寇」兜攏在一塊。《野叟曝言》之倭患，同時融會了「嘉靖大倭寇」與「萬曆朝鮮戰爭」的形象。小說續寫文白等人攻入困龍島救駕，發現靳直通倭的書信，並據之擬定抵禦的戰略部署：

看到一書，是倭奴關白的書信，藏在袋內。……取出倭書，令將膠州、登、萊洋面各島，相去數里，東西南北方向，何處可以下碇，何處可以藏舟，何處險惡，何處平安，一一說出，用筆開寫。看過，即復畫一圖，注明某處伏兵若干，某處伏兵若干，臨期如此如此，令鐵丐牢記在心，方才就寢。（第 113 回，頁 1996）

文白知己知彼，果然先發制人。鐵丐等人即按照其計謀，實現平倭大業。其云：

照了文爺密札，派兵各洋埋伏。倭兵於二十五日到海州洋面，知道靳直已敗，各島已失，便要退兵。行長說：「我們兵力有餘，原只圖他指明路徑，島中諸將俱護駕入都，正好乘虛襲破護龍。護龍一下，各島勢如破竹，據了各島，便可出沒山東、江浙等省內地，這是絕好機會，豈可錯過？」關白大喜，二十九日半夜裡，來襲護龍。四面伏兵盡起，況大元帥合衛嬭子從島中殺出，倭兵大敗。一路追趕下去，方兄及各島俱出兵接應，連勝了數十陣。到了崇明洋面，只認已脫虎口，復行練兵休息，要來報仇。元帥追兵已至，倭奴拼命惡戰，亞魯伏兵猝起，又敗下去。到了松江洋面，只剩得幾隻船，還不心死，把船下碇，要劫掠蘇、松沿海州縣。又被三弟伏兵截殺，元帥及亞魯夾攻，方才膽落，揚帆而遁。又被咱領兵截住，三弟等追兵齊至，四面合圍，倭兵殺剩無幾，關白、行長俱帶著傷，方始投降。（第 119 回，頁 2106-2107）

10 錢靜方，〈野叟曝言考〉，頁 163。

評點者以「耐戰」說明倭兵的難纏。中國經歷三番兩次的圍剿，終於將關白木秀、行長、宋素卿等人俘虜，後來得到倭主源義的降表才又遣返歸國。在書中，豐臣秀吉被稱為「關白」或「木秀」，其妻「寬吉」，顯然是將「木下秀吉」之名一拆為二，¹¹ 其嬖臣「行長」乃影射朝鮮之役的將領：「小西行長」，毋庸置疑——從「關白」、「木秀／寬吉」及部將「行長」等線索可知，作者即藉此暗指豐臣秀吉。至於宋素卿則是「寧波事件」（1523）¹² 的始作俑者，年代實早於豐臣秀吉。《野叟曝言》在塑造倭兵集團時，虛、實交錯，而木秀初登場時形象還頗模糊，在之後的章節卻彷彿脫韁野馬般，展現出獸性的一面。

在「滅浙平倭」落幕後，文白因聞獅吼而失心，外邦、藩屬漸生怠慢之意，其中日本：「是年，日本、安南、扶餘三國並四川各土司，俱不入貢。……日本關白木秀夫婦，奇淫極惡，將倭王囚起，日夜練兵，欲雪敗降之恥。」（第 132 回，頁 2332）於是天子先禮後兵，遣使諭之，敕令文容、奚勤使日本。不料木秀、寬吉夫婦卻覬覦二人之美貌、白皙，木秀欲雞姦文容，文容自刎全節；¹³ 寬吉則得手於奚勤，但因奚勤陽物碩大，寬吉氣力猛烈，竟一個被搯死，一個被禽死，兩人屍首赤身交媾，緊緊勾抱，形成大喇嘛（木秀所崇敬的國師）所謂的「大歡喜佛涅槃之像」。¹⁴

正如林琳所說的，儘管文筆粗俗，但夏敬渠所寫出的豐臣秀吉，可

11 筆者按：「木秀」為「木下秀吉」之省略，「寬吉」則是取自「秀吉」的「吉」字，再胡亂地加上「寬」字而成的。載於（日）青木正兒，〈支那戲曲小説中の豊臣秀吉〉，頁 122。

12 指細川氏、大內氏爭奪派遣遣明船的權利而產生的喋血事件，宋素卿是細川氏方面的副使，透過賄賂取得與明朝貿易的資格，引發兩方衝突。詳見山根幸夫著，邱明譯，〈明代倭寇問題研究〉，《黃淮學刊（社會科學版）》1(1992): 78-82+116。

13 然而木秀對文容屍身仍頗有戀戀之意，「轉身坐下，還把文容衣服掀開，周身撫弄」（第 132 回，頁 2335），表現了屍姦（necrophilia）的變態心理。

14 《野叟曝言》第 133 回大喇嘛解釋何為「大歡喜佛涅槃之像」：「這大歡喜佛便是西方的盤古皇帝，開闢時降下這兩尊古佛，一男一女，每日歡喜交媾，生下西天諸佛。數百劫後，兩尊古佛入涅槃時，即示此像，故號大歡喜佛。西方為極樂世界者，此也！」，見頁 2341。

以說是飽含了中國人的厭惡與蔑視之情的奇淫極惡之代表。¹⁵ 謝君也指出，明、清小說中對倭寇之淫描寫最為突出的，正是《野叟曝言》，其刻劃倭寇的荒淫，已經達到了近乎變態的地步。¹⁶ 以上觀點並沒有太大爭議，然而，除了這段描寫帶給讀者淫惡、醜化的直接感受以外，作者為何如此布局？背後有何寄託？則是需要釐清的問題。

首先，王瓊玲提到明、清鼎革之際，家族中有忠僕徐秀保護幼主逃亡，馮、潘、高等四義僕則隨先人殉死，因此小說中屢屢出現僕人救主或犧牲的場景，文容、奚勤即是這樣的代表——兩人曾助文白平定景王、攻殺毒龍，最終更不屈於玷污之辱，客死異域。¹⁷ 另一方面，小說亦透過這段描寫宣洩了對前明倭患的憎惡。第 132 回總評說：「然寫奚勤之死，不太虐乎？倭奴之禍中國也酷矣，非此不足以醜之，雖虐庸何傷！」（頁 2339）可見相關情節於家、於國，都有一定的抒懷作用。

而從小說的性描寫來看，《野叟曝言》存在著以「性武器」制服、消滅邪佞之徒性變態行為的弔詭性，並被評點者概括在「崇正闢邪」的大纛之下，作者亦冠冕堂皇地描繪出一幕幕「以淫制淫」的「性戰」戲碼。¹⁸ 第 104 回總評云：

作者好為穢語，亦善寫穢態，不寫則已，寫必極情盡致。……兵家貴能用間。素臣用兵之處，無非淫人。故孽龍好淫，則用奚勤夫婦；猴、狗好淫，則用韋忠、奚勤。異日以容兒媚其氏，即以誅景王；以奚勤為歡喜佛，即以滅倭奴，同是一副筆墨。……可知此書大旨，在乎崇正闢邪，而以間兵作奇兵，不得不以治淫人之法治之也。（頁 1858-1859）

此外，侯健提到，文家很少有人死亡，而全書死亡的只有兩個僕人，就是不幸在出使日本時被逼姦橫死的文容與奚勤，代表著「性」導致死亡

15 林琳，「論清代通俗小說中的日本人形象及其發展演變」（杭州：浙江大學日語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頁 10。

16 謝君，「明清小說與倭寇」（杭州：浙江工業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0），頁 45。

17 王瓊玲，《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頁 30-31。

18 楊旺生，〈《野叟曝言》的性描寫藝術及對文本價值的影響〉，收入蕭相愷等選編，《夏敬渠與屠紳研究論文選萃》，頁 273-274。

的恐懼。¹⁹ 而若按照艾梅蘭 (Maram Epstein) 之詮解，這種恐懼的意義或緊張的關係，從象徵性敘事的觀點來看，可以視作一種「陰陽圖釋」，亦即「正統 (陽) / 異端 (陰)」之間的碰撞。不能忘記在最開始，正是因為日本拒絕承認中國的宗主地位 (陰的表現)，才導致了文容、奚勤必須冒險渡過象徵「陰」的水域，來到島嶼之國：日本，而島嶼的意象在 63 回的臺灣與 134 回的扶桑彼此串起，也同樣出現了淫荒的女性角色：山魃與女王，前者曾色誘文白；後者則對錦囊逼婚——「她」們與寬吉最終成為「大歡喜佛涅槃之像」的浪蕩姿態互相呼應，表現出對「陽」的侵犯與挑戰。至於日本人在節制性慾方面的無能，則標誌著該國在道德、文化和政治上對儒家規範的抵制。²⁰

因此，夏敬渠在這裡的描寫，最終要批判的是日本因供奉佛氏，不服聖教的愚癡，甚至導致全境「求見真身者，必大布施，或是少年女人，信心歡喜，方得放入。一時舉國若狂，金銀米麥，如山積起」(第 133 回，頁 2343) 的瘋癲圖像。第 133 回總評說道：

日本雄踞東海，有四五千里之地，其民大都徐市童男女之後，境內山川清淑，氣象萬千。中國如隋煬之好勤遠略，未嘗越高麗而東，則孤懸海外，不被兵革，數十年如一日。乃荒淫醜穢，至於如此。蓋聖人之教不行，雖開闢已久，仍如混沌。作者扶翼聖教之心，於此可知。……木秀夫妻作亂宣淫，而倭王為其所滅，倭民為其所役，似未聞聖教之處，方合有此事，乃獨崇信喇嘛，依言行事，佛氏之教，固先孔孟而行乎？作者深惡二氏，醜倭人，即醜佛教，有不便放言於中國者，則於此放言之。而亦以見佛教之惑人，於亂臣賊子為尤甚。(頁 2355)

張哲俊曾提到，在中國文學中，倭僧向來是理想的日本形象的代表，但在《野叟曝言》中則是淫蕩無比的醜類，²¹ 其實原因就在於小說家個人對理學以外思想的極端鄙夷。日本為篤信佛教之國度；江陰學風及夏敬渠

19 同上註，侯健，〈《野叟曝言》的變態心理〉，頁 235。

20 同上註，以上詳見 (美) 艾梅蘭 (Maram Epstein) 著，羅琳譯，〈拓展正統性：《野叟曝言》的敘述過度與行權所體現的真〉，頁 316-317。

21 張哲俊，《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頁 331-332。

自身的祖考家風，則啓迪了小說家「崇程朱、斥陸王」、「反佛道」、「滅異端」的思想。²²是以中、日之間的齟齬，在故事中可說是「宗教的戰爭」：錢靜方認為，作者惡日本崇拜佛教，因造作平倭之說，此與征印度，破錫蘭，同一夢想而已；²³王瓊玲也指出，夏氏橫掃日本的想法，乃基於厭惡佛教（日本乃一佛國）。²⁴換句話說，政治上的大一統，意味著思想的大一統：在國外伴隨著武力征服的同時，在思想上也要實現獨尊「聖教」，所以除了日本在第137回，由文白督同文恩、錦囊等，議除東洋佛教之外，蒙古、西藏等地也都遭到了滅佛的命運，西洋的基督教則隨著景日京的征服歐羅巴洲而被掃蕩一空。²⁵

綜合而言，《野叟曝言》在塑造豐臣秀吉形象時，是帶有個人家、國之感，同時以「以淫制淫」、「崇正闢邪」的特殊敘事手法，來達到「正統／異端」的辯證，最終要宣揚的是排斥緇流的主張，甚至大膽地提出渡海討伐倭國的臆想。小說續寫木秀弒主發兵：

木秀自真身入寺以後，忽想念文容，記起寬吉之言，便差官賚著厚幣，去結好琉球。將倭主全家殺害，凡源氏一族，老少不遺，以除後患。於十月出兵，先搶福建，邊報飛馳至京。……只有日本一國，雖亦入貢，奚勤奏章可據，而跟問從人，俱云兩人無病進宮，虛實未定，今聞兵搶福建，益知其詐。十一月初一，天子降旨，封文龍為征倭大將軍，吉於公以原官贊畫軍務，加文恩正總兵官為副，加聞人傑參將、錦囊游擊為正副先鋒，統領浙江、福建兩省官軍會勦；調龍生、鐵面率島兵於上流

22 夏敬渠出身江陰（今屬江蘇），該地理學風氣肇始於北宋楊孝孺之治理，而後經王棠、鄭謬、尤袤、楊名時等人推廣及薰陶，治學偏於程朱學風，而夏敬渠族人夏宗瀾、夏祖熊等師事楊明時，又趨於虜廓怪異，崇尚剛猛峭直，以打僧罵道為盛業，影響了小說家的思想內涵。以上可參見王瓊玲，《清代四大才學小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頁117-122；王瓊玲，《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頁87-105；王瓊玲，《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頁112-126。

23 錢靜方，〈野叟曝言考〉，頁163。

24 王瓊玲，「野叟曝言研究」，頁66。

25 楊娟娟，「夏敬渠《野叟曝言》研究」（贛州：贛南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21。

協剿；限十日內出兵。（第 133 回，頁 2343-2344）

在夏敬渠的筆下，木秀比傳聞中的秀吉奪取關白之位更加十惡不赦，²⁶ 以至於將倭主滅門、悖反中國的地步，簡直膽大妄為，泯滅人性。就外觀來看，木秀雖然還是人類的模樣，但其醜惡暴虐，與短篇小說〈斬蛟記〉中的「非日本人，非中國人，蓋異類妖孽也」的惡龍來對比，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²⁷ 因此青木正兒形容這樣的形象是「猛惡無道的妖精，像鬼怪般的蠻族酋長」。²⁸ 饒富意味的是，文本中中、日雙方的軍隊本在沿海交鋒，而決勝的地點卻來到了臺灣，而非「嘉靖大倭寇」主戰場的閩、浙，或者「萬曆朝鮮戰爭」主戰場的朝鮮：

天子因倭國有「木本水源，水枯木盛；六雄效順，水木俱盡」之謠，將福建六雄，預調在浙、閩連界之所，聽文龍驅使。合力攻勦，連戰連捷。吉於公令聞人傑、施存義赴琉球合兵，攻其後戶；賽呂、袁作忠、林平仲、劉牧之、朱無黨搗其前門；龍生、鐵面、奚奇、葉豪等於海中游徼，專截倭國救兵。文龍神勇，於公善謀，文恩、錦囊皆慣戰之將，寤生、長生皆致死之師，木秀雖有萬夫不當之勇，倭兵雖有百戰不疲之勢，亦俱殺得抱頭鼠竄，盡力逃跑。被文龍一直趕至雞籠山下，三面攔截，水洩不通。用於公之計，緩攻以坐斃之，使兵不血刃，遂將各港口塞斷，日夜巡徼，休兵蓄勢，以收全勝。……木秀只剩得五號船攔截獨港，自己領驍將親兵，紮營山內，以為犄角。每日獵取禽獸，抄掠荒村，以為

26 中國對於豐臣秀吉躍居關白的理解，可參清·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平秀吉者，薩摩州人僕也，始以魚販臥樹下。有山城州倭渠名信長，居關白職位，出獵遇吉，欲殺之。吉善辯，信長收令養馬，名曰木下人。信長賜與田地，於是為信長畫策，遂奪二十餘州，會信長為其參謀阿奇支刺殺，吉乃統信長兵誅阿奇支，遂居關白之位，因號關白，以誘劫降六十六州。」見卷 62〈援朝鮮〉，頁 670-671。筆者按：阿奇支即為明智光秀。

27 在該篇小說中，豐臣秀吉被視為蛟龍的化身：「關白平秀吉者，非日本人，非中國人，蓋異類妖孽也。昔旌陽許真君斬蛟時，有小蛟從腹而出，以未有罪，不加誅。縱入江，歸大海，至日本之紅鹿江銀蛟山居焉。歷一千二百餘年，所害物類，不可勝紀。今又化為人，即平秀吉也。」此作品轉錄於孟森，〈袁了凡〈斬蛟記〉考〉，載於氏著，《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 73-80。

28 （日）青木正兒，〈支那戲曲小説中の豊臣秀吉〉，頁 124-125。

軍食，專待救兵。（第 133 回，頁 2349-2350）

評者解釋「木本水源，水枯木盛；六雄效順，水木俱盡」，說「倭主姓源，與木秀為水木」（頁 2349），說的是日本國內的政治傾軋；倭主姓「源」，是中國人混天皇與幕府為一談的傳統思維。而「六雄」則別有伏筆，並非朝廷以為的「福建六雄」，而是曾為文白、錦囊遊臺時所救的六個大熊。此外，倘如論者所言，《野叟曝言》是以康、乾年間「宏大的帝國版圖」為模型，那麼這種「盛世的頌歌」當然也包括了 1683 年施琅消滅明鄭的戰役，²⁹ 而書中明軍與倭軍的戰鬥，則在某種意義上重現了當時波濤洶湧的海戰，地點也從勝國的東南或朝鮮，轉移到時人記憶猶新的臺灣了。

不過，木秀雖然被困在雞籠山，卻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加上文容二子寤生、長生躁進，被倭軍擒獲，又差點受到木秀的侮辱，使得情節再掀波瀾。所幸千鈞一髮之際，得到錦囊援兵、文容顯靈之助益：

錦囊立出船頭，見荒灘之上，隱隱有人站立陡岸，於雪光下定睛細看，儼似文容，將手頻招。因令舵工望著陡岸開去。舵工道：「此處俱是亂石，必致破舟！」錦囊道：「你不見潮水陡長了幾尺嗎？就有石頭，亦自無礙。違令者斬！」舵工見船邊水誌，真個長潮三尺，遂放膽將船把定，順風而行，不消一刻，已泊荒灘。錦囊領兵，齊躍上灘，見灘邊泊有小船，船上伏有本營兵目，連忙根問。兵目道：「兩位小將軍上涯不回，幾次倭兵到灘來巡，嚇得要死！幸倭兵如瞎子一般，對面不見。〔文容之靈〕小的們要回船，既是逆風，又不敢不守候小將軍，只得拼死等著！」錦囊便不再問，跟定文容魂影，攀援上涯。路上偶遇哨探，俱行殺死，直趕至木秀大營，見文容魂已入營，拼命揮兵，奮勇殺入，斫斷絆索，直搶進營。倭兵驚起，被五百驍卒，殺得血濺滿營，四散逃跑。（第 133 回，頁 2351）

上文顯露了海戰特有的自然條件限制：潮汐與風向。潮汐幫助錦囊順利克服危險的暗礁，但風向卻也使得寤生、長生所率兵將無法撤退。儘管客觀條件有利、有不利，然而受勝利女神眷顧的，卻是有文容襄助的明

29 楊旺生，〈論《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義色彩〉，《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4.4(2004.12): 89-90。

軍。「文容之靈」、「文容魂影」不僅遮蔽了巡邏的倭兵的視線，而且指引了一條進攻的路線，殺得倭兵措手不及，而木秀則是「被文容魂影一手攔住腎囊，叫疼喊痛，轉動不得」，輕易被被錦囊制服。惡貫滿盈的木秀後來不但被燒去陽物，且押解至京城正法，此正所謂「慕容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明、清小說對於處置豐臣秀吉的想像，至此到了天翻地覆的程度。而木秀雖然被俘，但倭兵聲勢仍舊浩大，這時輪到人熊出來解圍：

看那山時，四面參天石壁，只上來這一面稍有路徑，已被倭兵蜂擁而上，前無去路，後有強兵，文容魂影又已無蹤，慌急異常。忽然山洞之內，跳出十餘個人熊，前來撲捉。寤生等一齊發抖。錦囊看那人熊，有一個有疣的，想起當年之事，急向人熊作禮道：「十五年前，我主人在此殺死夜叉，厚優過各位，未得酬情。今奉命征倭，被倭奴追逐至此，望各位再助一臂之力，感恩不盡！」那人熊把錦囊細視，跳笑了一會，便直奔倭奴。倭奴見此凶獸，本是膽寒，只得拼命持刀砍斫，俱被格落，扯住一個，便一撕兩半，血肉淋漓，一連撕死數人。嚇得倭奴魂不附體，翻身逃走。錦囊等吶喊助威，隨後趕逐。倭奴自相踐踏，落崖墜澗，死者無算。人熊腳踏手撕，兼之走及奔馬，錦囊率五百軍士，復奮勇追殺，到得日中，已把逃跑不及的倭奴，盡數撕踏砍斫而死，不留一個。錦囊看去，仍是六個大熊，其餘七八個，皆新生小熊也。（第 133 回，頁 2352-2353）

在這場戰役中，明軍接連獲得英靈、人熊的幫助，才終於掃蕩困獸猶鬥的倭兵，可說是一波三折。而王瓊玲等人根據這段情節，以為作者誤把臺灣、日本連為一處，在地理認知上有所瑕疵，³⁰ 這其實是不對的，因為小說接下來就說文龍（文白之子）：「一面分咨浙、閩沿海水師鎮將，多備軍糧，即日渡海，於十二月初七日，在雞籠山外護取齊，準備回搗倭國，毋得違誤。」（第 133 回，頁 2353）按照小說之脈絡，明軍生擒木秀的地點的確是在臺灣，而後在 134 回才集中書寫中國將日本納入版圖的大膽想像，從「回搗倭國」一語可證明作者清楚兩者之差異，且後

30 王瓊玲，《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頁 305。

文鐵丐又說：

今吾侄奉命出師，旬日之間，元兇已獲，東瀛三島不足平也！但木秀已死，尚有琉球黨惡，謀害倭王，必得南向問罪，收入版圖，方無後患。……臺灣孤懸海中，久無所屬，亦宜乘勢取之。目前師船既多，軍威頗壯，廓清東南洋面，正在此時！（第 134 回，頁 2359）

足見作者頗能分辨日本、琉球、臺灣諸島嶼在方位、歷史之不同，彼此並不含糊。此外，在夏敬渠筆下：「原來木秀夫婦天生勇力，通國畏之如虎，諸臣中傾心獻媚，導以悖違。」（第 134 回，頁 2357）因此除了軍事防備上的擘畫外，中國方面也有自日本內部製造矛盾的嘗試，如第 65 回袁作忠提到「第二就是金面獠，複姓聞人，單名一個傑字，他到日本，並非貪圖利息，是去結識倭酋頭目，正為與靳仁作對起見」（頁 1206），後來更取得了可貴的情報：

素臣因問日本之事，金面獠道：「靳賊結連關白，俺便交結舊臣中之仇恨關白者。奈關白夫妻二人，俱有萬夫不當之勇，惡黨頗盛，一時未得其便，俟我朝興兵問罪，可作內應耳。」素臣記在心頭。（第 114 回，頁 2011）

從聞人傑的話語中，就可察覺木秀治下的人心浮動。並且以此作為契機，小說家寫出了別開生面的「渡海之戰」。

三、渡海之戰：「師入倭京，不折一矢」的樂觀想像

《野叟曝言》以文白為「奮武揆文，天下無雙」之英雄，其治下的軍隊也成為所向披靡的王師。果然明軍一抵日本，映入眼簾是一片簞食壺漿的景象：

這裡大軍數十號船，於初九日傍晚，已抵倭國東京港外，吩咐散泊，以觀動靜。那知倭兵竟無一船守口。……未到午牌，各人陸續回船稟明，原來倭主源氏一族，已被木秀幽禁，繼而送往琉球，教琉王用計戕害，竟無噍類。倭民切骨，自木秀敗逃，搜尋源氏，擬圖復興。……正當紛紛擾擾，傳聞木秀被俘，天兵全勝，莫不翹首盼望。而木秀派留已敗兵

將，漸漸散歸，單有一種匪徒，趁著國中無主，蠢然思動，以故民間之望天兵，愈加激切。……那些倭民見是中朝統帥旗幟，一時喧傳，聚集觀看，老幼男女，歡聲雷動，都在岸上伏地磕頭。剛進內港，即有許多倭人，撐出小船，前來挽引坐艦，一路山明水秀，煞好風景。（第 134 回，頁 2359-2360）

《野叟曝言》的作者在刻劃這些情節時，透露出一個觀點：那就是明代時，日本之所以會在海疆啓釁，造成兵連禍結的慘劇，皆是由一人之意志所主導的，而那罪魁禍首正是「平秀吉」。爰此，在某種程度上，日本的軍民也不過是被迫捲入戰火的受害者。第 134 回之總評如此說道：

平秀吉，一日本亂人也，倭君得而誅之。徒以結黨叛主，不事內訌，而為中國沿海之患，故日本無起而圖之者。譬如家養瘖狗，狂噬市人，而不反嚙其主，則主人亦聽之矣。……師入倭京，不折一矢，而坐鎮之。可知倭人並無寇明之志，特一亂人肆掠海濱之技倆耳。議防議戰，幾及百年。果有素臣、雲從父子，安用此紛紛為哉？（頁 2374-2375）

《野叟曝言》接下來敘說文龍、文恩（奚囊）等人在倭王親信舊臣：三島善長、村溪性良輔助之下，整頓內政，安殮奚勤，剿滅喇嘛，並進取琉球、收括扶桑，從首里救回倭王幼女，責文恩照管（後兩女婚配寤生與長生兄弟）。最後由聞人傑、施存義平定木秀的老巢：薩峒摩，「此島一平，全倭皆為中國有矣。」（第 134 回，頁 2367）就在這個時候，作者拋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見解，日本如能在「聖教」的薰陶之下移風易俗，棄邪歸正，「洵東瀛之雄鎮，而遼海之屏藩也」（第 134 回，頁 2360），而在群龍無首的情況下，亦不妨由中國官憲管理，因此文龍旋即交待文恩說：「汝且暫攝其權，異日得有源氏宗支，仍復其國。倘竟無人，則收入版圖，不過內地行省之制」（第 134 回，頁 2368-2369）——這真是相當奇異又樂觀的構想。

夏敬渠似乎認為，「中國之大，兵將之多」，征服日本當是易如反掌的事情，而採取守勢則是可恥的。在小說中，以文龍為首的虎賁之士，迅雷不及掩耳地將東瀛各島的政權瓦解，讓評點者亦不免讚嘆如戚繼光、胡宗憲、俞大猷等抗倭名將，皆應汗顏：

天子命文龍為征倭大將軍，而文恩副之，吉於公參軍，聞人傑、錦囊為先鋒，聲勢赫赫。而況以久為海患之倭人，武勇荒淫之木秀，度必如素臣征苗之役，數倍其期，然後可克。乃連連敗北，困走雞籠，而全倭已在掌握。自古用兵，能於旬日之間，建囊括海外之功者乎？讀竟此回，試取《明史》征倭事跡較之，當日名臣如戚繼光、胡宗憲、俞大猷輩，皆應汗顏。……獨怪中國之大，兵將之多，以一海外亂民，而竟畏之如虎，坐靡千萬之餉，使縱惡流毒數十年，俟其死而後已，豈不轉貽日本笑哉！作者暢快言之，以愧當日之謀防倭者。旬餘而逆酋被俘，又旬餘而全倭大治，千數里海外之地，盡入版圖。豈惟防倭諸君慚惶拜倒，即斤斤焉經營支島者，亦在唾棄之餘矣。（第 134 回，頁 2374-2375）

小說原有虛構之特權，能恣肆去決定戰役之過程與成敗，特別是由杜撰之人物擔綱遠征的將帥時，更能拋棄史傳的束縛，搬演「萬夫莫敵」的不敗神話，並不足為奇。例如朝鮮受到壬辰倭亂的影響，亦曾產生像是《六美堂記》（육미당기）這樣的作品，寫新羅金太子掛帥大勝日軍，占領了日本的首都江戶的故事。³¹不過自古以來，由於日、韓兩國僅隔海峽相望，九州又是倭寇之淵藪，朝鮮半島首當其衝，自然也有反擊的嘗試。包括 1389 年、1396 年及 1419 年，韓方分別有三次以正規軍攻擊對馬島的行動，且基本上都大有斬獲。³²可見東國說部之言雖出於想像，但亦有事實的根據作為支撐。

不過回到中國的部分，《野叟曝言》卻確切地安排明軍遠赴重洋，接連囊括臺灣、日本、琉球、扶桑、薩喇摩等地的描寫。果真能如此順

31 小說介紹見（韓）崔宮著，金錦善、魏大海譯，《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頁 64。

32 如 1419 年朝鮮軍隊攻擊對馬，以四百五十四艘兵船，兵員一萬七千二百八十五人的規模登陸，奪得大小船隻二十九艘，燒毀民家千九百三十九戶，斬首百零四，生擒二十人，芟除田中作物，獲得被倭寇擄去的中國人百三十一名，並將許多日本人作為俘虜帶回朝鮮。這次的行動也帶給京都不小的恐慌，各種浮誇的傳言甚囂塵上（如有報告漂浮海上的外國船隻有八萬餘艘、此次作戰乃是大唐、南蠻、高麗的聯合行動、敵人的大將是個女人等等），展現出蒙古入侵的恐怖後遺症。見（日）田中健夫著，楊翰球譯，隋玉林校，《倭寇——海上歷史》（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1987），頁 39-42。

利的話，那麼中國是否曾有過這樣的企圖與嘗試呢？黃仁宇在提到倭寇騷擾東南沿海的情形時，認為就政治狀況與軍旅編制的條件來說，一般人在主觀上應該都會覺得這頗不合理；釜底抽薪的辦法，反而是直接討伐日本：

在 16 世紀中葉，日本這一個島國能夠嚴重威脅本朝東南沿岸各省的安全，這種現象是很難理解的。合乎邏輯的倒是本朝的士兵應該越海進攻日本。因為當時的日本不僅地狹人稀，而且幾十年來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內戰頻仍，法律和紀綱可謂蕩然無存。本朝是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國家，被一個極有組織的文官集團所統治，中央指揮地方如身之使臂，極少發生抗命的事情。同時我們這個帝國在名義上擁有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常備軍，人數多達二百萬。³³

上引之言，表面上與《野叟曝言》評點者所提到的優勢：「中國之大，兵將之多」彼此呼應，不過實際狀況卻是兵員、補給、運輸、軍備、將領的不足或低能，並處處受到文官集團的掣肘。明朝以文官作為總督巡撫，指揮各級武官，總督巡撫之下還有「兵備使」或「海防道」，其名為監察，實則握有調度攻防的權力，人事任免和交通各項也由文官主持——這種軍事體制的設計，其重點不在於對付敵國的全面入侵，同時也不打算全面進攻敵國。³⁴

軍事上缺乏進取的能力，在某種程度也來自於明朝外交政策的收縮。自洪武（1368-1398）御宇開始，就對後世帝胄立下了「不征之國」的約束，《皇明祖訓》首章明言（注文從略）：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征諸夷國名開列于後。東北：朝鮮國。正東偏北：日本國。正南偏東：大琉球國、小琉球國。西南：安南國、

33 黃仁宇，《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2009），頁 197。

34 同上註，頁 197-200。

真蠟國、暹羅國、占城國、蘇門答刺、西洋國、爪哇國、滄亨國、白花國、三弗齊國、淖泥國。³⁵

「不征之國」的外交方針，有客觀局勢的審度，也有歷史因素的借鑑。尤其以跨海出擊日本來說，早在元世祖（1271-1294）時就有群臣提出反對，如劉宣點出隔海支援的困難：「況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衆履險，縱不遇風，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³⁶又趙良弼曾出使日本，提出以下見解：「其地多山水，無耕桑之利，得其人不可役，得其地不加富。況舟師渡海，海風無期，禍害莫測。是謂以有用之民力，填無窮之巨壑也，臣謂勿擊便。」³⁷

征討日本既困難且危險，即使得勝了亦無益於中國的壯大，可說是「得志於齊，猶獲石田」。而這個假設在付諸軍事行動後更獲印證。陳天祥云：「且自征伐倭國、占城、交趾、爪哇、緬國以來，近三十年，未嘗見有尺土一民內屬之益，計其所費錢財，死損軍數，可勝言哉！」³⁸而吳萊〈論倭〉則是從古史經驗中總結出征倭的「無用論」：

昔隋人統五十二萬人伐高麗，高麗終拒守不下，所恃者鴨綠一小江耳。今倭奴之強，故不如高麗，而大海之險，甚於鴨綠水者，奚啻幾十倍。……吳嘗浮海，伐夷洲矣，獲其人三千，而兵不助強。隋嘗浮海，伐留仇矣，拔其城數十，而國不加益也。何則人非我同嗜欲，弗能生也；地非接我疆土，弗能有也。為今之計，果出兵以襲小小之倭奴，猶無益也。³⁹

石原道博認為，以上觀點加上元朝由「恫嚇外交」到「宥和外交」的懷

35 收入明·朱元璋等撰述，《明朝開國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本），頁 1588-1591。

36 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168〈陳宣傳〉，頁 3952。

37 同上註，卷 159〈趙良弼傳〉，頁 3746。

38 同上註，卷 168〈陳祐傳〉，頁 3949。

39 收入（日）伊藤松著，杉山二郎解說，《鄰交徵書》（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2 篇卷 1，頁 215-216。

柔政策的調整，以及爲了應付武裝商人團的「倭寇」，而由「積極的攻擊」轉爲「消極的自衛」，都曾對洪武帝的「不征之國」構想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⁴⁰

更何況日本確實不畏戰，除了兩次擊敗蒙軍外，懷良親王明朝稱之爲「日本國王良懷」）在回覆太祖「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廷；不臣，則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爲寇，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補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⁴¹ 以及「若叛服不常，構隙中國，則必受禍。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俘獲男女以歸，千數百年間，往事可鑑也。王其審之」⁴² 之威脅時，以不卑不亢的態度應對：

臣聞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略之兵法。又聞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精銳之師，來侵臣境。水澤之地，山海之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賀蘭山前，聊以博戲，臣何懼哉。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自古講和爲上，罷戰爲強，免生靈之塗炭，拯黎庶之艱辛。特遣使臣，敬叩丹陛，惟上國圖之。⁴³

「倘君勝臣負，且滿上國之意。設臣勝君負，反作小邦之差」，該說與元人王磐「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則不武，不勝則損威，臣以爲勿伐便」⁴⁴ 的看法有異曲同工之妙，而太祖的反應是「帝得表愠甚，終鑑蒙古之轍，不加兵也」。⁴⁵ 事實上，洪武帝對過去中國出兵海外的效益不彰，勢必心裡有數，其對懷良親王所釋放出來的恫嚇，充其量不過是虛張聲勢罷了。

40 (日)石原道博，〈日明交渉の開始と不征国日本の成立——明代の日本觀（一）〉，《茨城大學文理學部紀要（人文科學）》4(1954.3): 21-26。

41 見明·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卷 2 上，頁 155。

42 見黃彰健校勘，《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1 年刊本縮編），卷 138，頁 570。

43 見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322〈日本傳〉，頁 8343-8344。

44 見明·宋濂等撰，《元史》，卷 160〈王磐傳〉，頁 3755。

45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卷 322〈日本傳〉，頁 8344。

綜合來看，征討日本有現實上的侷限，也有「元」鑑不遠的教訓，於理更「勝之不武，不勝損威」，的確是動輒得咎的下策。取而代之的，是「不征之國」的自我克制；而「不征之國」的提出，表面上是基於「興兵不祥」的敦睦善意，實際上是明朝根本沒有發動「渡海之戰」的能力——不是「不願」，而是「不能」，倒不如將諸國分層級，劃歸於自己建構的「朝貢系統」與「禮制之世界」之下，以接受朝貢或者絕貢作為控制諸國的手段。而且，既然這種方式已具有解決外交糾紛的效果，也就毋須再訴諸於不可靠的武力了。⁴⁶

除了以朝貢、禮制的手段來壇坫週旋之外，《野叟曝言》中受到極端鄙夷的沙門，在歷史上卻是維繫中、日邦交的重要窗口。田中健夫曾點出元代時禪僧往來的交流，為日本帶來禪林制度、漢詩、漢文、儒學、史學、書道、繪畫等學問的傳播。⁴⁷雙方在宗教上的互動，從未隨著政治關係的惡化而冷卻，因此日本對於佛教的崇敬，也成為明太祖懷柔日本的管道。《殊域周咨錄》卷2〈日本國〉記載：

五年，倭復寇邊，海上不寧。上謂劉基曰：「東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蚊蚋警寤，自覺不寧。議其俗尚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降。」遂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罐僧無逸往諭。……闡等自渝州啟棹，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入王都，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聖訓，敷演正教。聽者聳愕，以為中華禪伯，亟白於王，請主天龍禪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名剎也。）闡等以無上命，辭之，為宣國家威德，罔間內外，且申所以來使之意。王悅，具表遣使隨闡等入貢。……而祖闡、無逸宣化海外，能格戎心，又可見異端之中，亦有乘槎應星之彥。論者謂國初高僧泐、復為首，予則謂闡、逸秉節懷遠，不辱君命，勝於元朝水犀十萬多矣。⁴⁸

46 (日) 岩井茂樹，〈明代中国の礼制覇権主義と東アジアの秩序〉，《東洋文化》85(2005.3): 139-141；安藝舟，〈十五「不征之國」新論——兼談明太祖的地緣政治理念〉，《東南亞研究》5(2015): 102-104。

47 包括一山一寧、清拙正澄、明極楚俊、竺仙梵遷等中國名僧來日，以及日本雪村友梅、石室善玖、中岩圓月等禪僧入元，帶來兩國文化的交流。見(日)田中健夫，《倭寇——海上歷史》，頁26-28。

48 明·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卷2，頁52-54。

祖闡亦即仲猷，無逸又名克勤，兩人不負使命，以令人景仰的身分（中華禪伯）換來破冰的外交碩果。爾後明、日的來往，僧侶亦持續扮演穿針引線的角色；日本方面，包括祖來、宣聞溪、道幸、宗嶽等也都曾入明進貢，以示交好之情。⁴⁹ 相較於夏敬渠在小說中對佛教的排斥，現實中的高僧為和平所帶來的貢獻，卻獲得「勝於元朝水犀十萬多矣」的揄揚。因之當文龍等人用中國曾經失敗的遠征部隊取得勝利，並在日本毀棄貴為兩國橋樑的佛教時，看上去就更覺是空中樓閣的荒誕了。

四、不征之國的破滅：從現實的構想到小說的實現

小說固然有荒誕的一面，卻不代表明朝從來沒有萌生過打破「不征之國」原則的想法。姑且不論成祖（1402-1424）時就曾發動了「明入越」戰爭（1406-1407），就日本來說，萬曆帝（1572-1620）也因為豐臣秀吉的蠢動，考慮過直接征討日本的戰略。在朝鮮戰爭以前，有位曾參加過嘉靖時抗倭活動的仇俊卿老人，以九十歲的高齡上書：「請如漢橫海樓船故事，以張國威」，⁵⁰ 表現出民間高亢、激情的聲浪。另外，兩廣總督劉繼文曾提出曉諭「澳夷」（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擒斬關白入獻」的建議。⁵¹ 而朝鮮《宣祖實錄》亦記載了中國「令我國要結暹羅、琉球等國，合兵征勦」⁵² 之指令，更可視作是明神宗本人「先發制人」的企圖。綜合上述史料，鄭潔西提出明朝因屢遭倭寇侵擾卻未能將之根除，一直

49 (日)石原道博，〈日明交渉の開始と不征国日本の成立——明代の日本観（一）〉，頁 27-31。

50 見清·盛楓輯，《嘉禾徵獻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古編清代稿鈔本，2013，中山大學圖書館藏鈔本），卷 12（仇俊卿傳），頁 302。

51 見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1 年刊本縮編），卷 242，頁 11333。

52 見(日)末松保和編纂，《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卷 27，頁 332。不過，這個要求被朝鮮以「小邦之人，短於舵檣，不習下洋」的藉口婉拒了，因此未見施行。諸邦國中比較積極響應的是暹羅，兩廣總督蕭彥卻以「夷心難測」的理由上奏勸止。見鄭潔西，〈16 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戰爭與整個亞洲世界的聯動——以萬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羅」征討日本議案為例〉，《海洋史研究》3(2012.5): 134-139。

醞釀著征討日本的想法，而其戰略則是以朝鮮、暹羅、琉球和葡萄牙人爲夥伴的部署。⁵³

豐臣秀吉出兵後，正式在廷議提出單獨由中國海軍「征倭搗巢」的，是萬曆二十年（1592）的張文熙，其人建議調集浙、直、閩、粵四省舟師，直攻日本，將關白「牽其東歸，杜其內犯」，但很快地遭到徐桓〈征倭當急搗巢非計乞詳審以收勝算疏〉的駁斥：

方今報倭警者岌岌矣，策倭患矣紛紛矣，大都以防禦爲要，策無能出奇制勝者。獨本兵慨然以征倭自任，而行人薛潘亦備陳其當急征，業已奉旨，選宣大、保定等鎮精兵，赴經畧調遣，一以援朝鮮，一以伐狂謀。誠得制勝奇畫，凱旋有日矣，迺太僕少卿張文熙調四省兵往以搗巢爲請。……臣讀《籌海編》云：「備倭之術，不過守、禦二者而已。」未聞泛舟大海，遠征島夷。蓋海中無風時絕少，颶風一作，天氣卽昏，舟遇沙礁，卒皆覆沒。以我之迷蹈彼之危，未有能必勝者。……張文熙疏稱調集四省舟師，奮勇搗巢，以牽其東歸，杜其內犯，此兵法所謂「批亢擣虛」，固爲良策，而其勢實有難行者。⁵⁴

張文熙的看法，在當時被視爲「可哂」。《萬曆野獲編》卷 17〈程鵬起〉云：

關白侵朝鮮事起，建白者章滿公車，石司馬以集眾思爲名，多所採納。其可哂者，如張念華罔卿文熙，議集浙、直、福、粵濱海四省之兵，入海搗日本之巢，已爲悠繆不經之甚，旋爲言路所駁，謂其騷動江南，罷不行矣。⁵⁵

可見張文熙的策略，在眾所撻伐的情況下黯然中止。然而就在次年，福建巡撫許孚遠又呈遞了〈請計處倭酋疏〉，希望採取「用間」、「備禦」、

53 以上詳見鄭潔西，〈16世紀末明朝的征討日本戰略及其變遷——以萬曆朝鮮之役的詔令資料爲中心〉，《明史研究論叢》8(2010): 218-220。

54 收入明·吳亮輯，《萬曆疏鈔》（《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卷 43〈東倭類〉，頁 589-590。

55 明·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萬曆野獲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卷 17，頁 2359。

「征勦」三管齊下的計謀，其中「用間」與「征勦」，就很接近《野叟曝言》所使用的戰術了：

臣等迂籌，以為今日之計，莫妙於用間，莫急於備禦，莫重於征勦。何者？倭酋倡亂，惟在乎秀吉一人，諸州酋長多面降而心異，中間有可以義感者，有可以利誘者。秀吉原無親戚子弟，股肱心膂之人，儻得非常奇士，密往圖之，五間俱起，神秘莫測，則不煩兵戈而元兇可擒。一獲元兇，倭亂頓弭，故曰：「莫妙于用間。」……臣等以為彼不內犯而已，果其內犯，大肆猖狂，乞我皇上與二三大臣定議征討，特發內帑百萬，分助諸省，打造戰艦二千餘隻，選練精兵二十萬人。乘其空虛，出其不意，會師上游，直搗倭國。順命者宥，逆命者誅，彼秀吉一酋，何能逃遯？此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名其為賊，敵乃可服者。故曰：「莫重於征勦。」⁵⁶

許孚遠的意見相較比較全面，也知道可以利用日本內部的矛盾，並指出出兵的時機在於豐臣秀吉發動「內犯」之際，頗有「圍魏救趙」的味道。在此文獻中，同時可以看到中國官憲對於渡海之戰的動員的估計。要打贏征勦日本的仗，許孚遠認為需要二千艘戰艦、二十萬兵員，《野叟曝言》中則是「連江衛所之船，共有二十四號大艦，三十號小艇，滿載五千兵，海面雖寬，亦覺擁擠」（第 134 回，頁 2358），廷議與小說的設想頗為懸殊，展現出一保守而一樂觀的不同數字。此次的間諜活動似乎收到了不錯的成效，薩摩的島津義久和福建方面有些聯絡。不過，在此同時，明神宗決定冊封豐臣秀吉為「日本國王」，化干戈為玉帛，這個「用間」或甚至「征勦」的計畫亦隨之胎死腹中。⁵⁷

萬曆二十六年（1598），因和談失敗及戰事拖延，中國再度出現了征討日本的構想，且這次進行了正式的人事調動：

調廣西總兵童元鎮于浙江，調浙江總兵李應詔于廣西，各鎮守。兵部言：

56 收入明·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風出版社，1964，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卷 400，頁 655-657。

57 鄭潔西，〈16 世紀末明朝的征討日本戰略及其變遷——以萬曆朝鮮之役的詔令資料為中心〉，頁 222-225。

「閩首發難，僉謂搗巢可以牽其內顧。童元鎮熟識島情，往年曾與搗巢之議。李應詔清介不擾，適與撫蠻相宜。」故相互更調，從御史唐一鵬之議也。⁵⁸

又兵部也再度把「用間」的戰略曉諭各督府施行：

至于閩首背道逆天，虐用其衆，聞各島憤怒，已非一日。糾合出奇，誠因勢利導之策也。舉事莫先于浙，莫便于閩、廣，以日本多兩省之人，可以響應；兩省多近洋之國，可以結聯。加之商販雜出其間，可以別用。是在各督府同心秘計，可以隨便酌行。如忠義可鼓，勿待正兵；事機可乘，勿待奏報。而一切假之便宜，毋以議論束縛，致令掣肘。上是其議。⁵⁹

在戰情吃緊的狀況下，萬曆帝已到了同意各省「隨意酌行」的地步，而地方官員如福建巡撫金學曾，也曾考慮過起用名將沈有容潛入日本，兵燹一觸即發。歷史的巧合正在於這次的戰雲密布，卻又隨著豐臣秀吉的溘然長逝而急踩煞車，中國軍隊繼元朝之後再度揮軍日本本土的嘗試，也就這樣無疾而終了。⁶⁰

綜合以上的歷史文獻與學界研究成果來看，自洪武至萬曆，朱明的對日戰略曾經歷過「不征之國」的自律到「征倭搗巢」的構想，之所以不征討日本，是因為國力不足、海象難測、勝之不武、得不償失等因素的考量，遂轉而以外交手腕（「朝貢系統」/「禮制霸權」）來箝制日本。不過，明太祖並不是從未萌生過征日「企圖」的，包括「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如吳大帝、晉慕容廆、元世祖，皆遣兵往伐」等恫嚇的文字，就是證據之一。到了萬曆朝時，由於豐臣秀吉對東亞秩序的衝擊，這個征日的「企圖」再次死灰復燃。最初，明朝希望聯絡朝鮮、琉球、暹羅、葡萄牙人等夥伴組成聯軍，直搗日本，但各國普遍反應冷淡，因之作罷。後來又有中國獨立調集浙、直、閩、粵四省舟師的提議，甚至海疆大臣

58 見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卷 318，頁 11683。

59 同上註，頁 11684。

60 鄭潔西，〈16 世紀末明朝的征討日本戰略及其變遷——以萬曆朝鮮之役的詔令資料為中心〉，頁 225-227。

還提出具體的數字：二千艘戰艦、二十萬兵員的規模，配合間諜戰術的使用，俾能擒賊先擒王。不過，後來懷柔政策佔了廷議的上風，這個計畫也戛然而止；爾後豐臣秀吉的薨逝更澈底解除了「東事倥傯」的海警，加上日本進入鎖國狀態，無意內犯，所有攸關「搗巢」的部署，亦永遠被埋藏在歷史洪流之中了。

爰此，《野叟曝言》中的渡海之戰，既有不合於歷史事實的一面，也有著暗合當政者思維的一面。前賢說明代自蒙元征日鍛羽以來，「然未嘗出海一步也」、⁶¹「中國迄未再出海征討日本本土」，⁶²這些看法都很對，卻未指出統治者曾有的想法與布局，彷彿相關情節全然是橫空出世的。其實，小說可以說是把洪武、萬曆兩位天子欲為而無力為，想做而不及做的「構想」化成「現實」，並忽略了令人忌憚的所有不利因素，像是戰備、風浪、補給等問題，用不費吹灰之力的方式實踐，甚至「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無用，也被轉作「洵東瀛之雄鎮，而遼海之屏藩也」的大用，展現出作者樂觀的想像力——考慮到其可能同時受到康熙平臺的啟發，又把中、日決戰舞臺設在雞籠山，這個高度的評價與臺灣作為江、浙、閩、粵之「左護」的戰略地位有關，⁶³即小說恐怕是把臺灣的屏障作用，移植到日本之上了。

誠然，夏敬渠創作動機及目的，非是要刻意打破明太祖及歷代帝王把日本列為「不征之國」的禁忌；而是要在虛構文本世界中滿足個人成為「奮武揆文，天下無雙」之士、子孫家奴皆為護國良將的夢想。儘管如此，其睥睨戚繼光、胡宗憲、俞大猷等人在文官掣肘、軍備落後的困境下，仍能化腐朽為神奇，成功防禦倭寇的貢獻；以及醜化沙門，未能看到中、日僧侶們穿梭於東海，為兩國和平所做出的努力，皆未免暴露

61 錢靜方，〈野叟曝言考〉，頁 163。

62 王瓊玲，「野叟曝言研究」，頁 65。

63 此說來自施琅上奏康熙帝的〈恭陳臺灣棄留疏〉，施琅提出「留臺」的考量還包括物產豐饒、人口眾多等要素，這是中國可以利用的優勢，臺灣的兵將（水師營和藤牌兵）甚至成為清朝與沙俄「雅克薩戰役」（Sino-Russian border conflicts, 1652-1689）的生力軍，與明太祖對於日本「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的看法完全不同。而經過姚啟聖、施琅、李光地等人對「留臺」的力陳其見，清廷終於決定留下臺灣，也果然收得「屏藩中土」的具體成效。可參見石弘毅，

出偏狹、傲慢的盲點。莫怪乎《野叟曝言》會被盧興基目為「讀書人做了二千年的夢」，並說文白簡直是一個口倡孔孟儒學，卻又法力無邊的怪物，他的主觀在無限止的膨脹中自我陶醉，在周圍的喝彩聲中獲得滿足，代表著舊時代讀書人的精神卑弱，是中國讀書人在科舉制度壓抑下的病態，也是他們在現實中未能實現，而在幻想中得以報償的一場大夢。⁶⁴

五、結 論

本論文在此節探討的是清代小說《野叟曝言》對豐臣秀吉之型塑，以及該書別開生面的渡海之戰。夏敬渠為了烘襯文白「奮武揆文，天下無雙」、「止崇正學，不信異端」的超完美形象，把包括 119 回「滅浙平倭」在內的諸多功勳，皆歸功於其洞燭機先的韜略之下。即便主人翁因失心而不省人事，其僕人和兒子仍持續活躍，先後擔任天使與元帥，負責宣諭 / 征討日本的重責。132、133 回集中敘述倭國在木秀、寬吉夫婦把持下，篤信佛教、淫亂無度的瘋狂，導致文容、奚勤屈辱的犧牲。這個荒誕的橋段，代表作者「崇正闢邪」、「以淫止淫」的手法，是以「陰陽圖釋」來突顯「正統 / 異端」之間的碰撞，最終要指責的日本作為「佛國」，不信「聖教」的墮落，故中、日兩國的交鋒，其實是一場「宗教的戰爭」。

133 回雙方的死鬪陷入白熱化，但決勝的地點既非嘉靖大倭寇時的閩、浙諸省，亦不是萬曆時的朝鮮半島，反而是臺灣的雞籠山，側面顯示時人對於康熙平臺的嶄新記憶。而在這場戰役中，明軍靠著文容魂影和六頭人熊的鼎力相助，有驚無險地俘虜淫惡無度的木秀，化解了沿海的倭患。次回，小說作者更上一層樓，又寫文龍率艨衝直抵倭國東京港，兵不血刃地接收厭惡木秀暴政，心向中朝的日本，加上囊括琉球、扶桑、

「清代康熙年間治臺策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頁 8-34。

64 盧興基，〈讀書人做了二千年的夢——從傳統文化心理看《野叟曝言》〉，收入蕭相愷等選編，《夏敬渠與屠紳研究論文選萃》，頁 247-248。

薩峒摩諸島，完成了澄清東海的壯業，超乎俞龍（大猷）、戚虎（繼光）等名將之上，佈局頗為大膽。

不過，「征倭搗巢」的說部之言，卻不完全是空穴來風。雖然明代自洪武立國即對日本貫徹著「不征之國」的戰略，但包括明太祖本人即曾在曉諭懷良親王的詔書中發出「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的威脅，明神宗時更曾經多次廷議征日，包括仇俊卿、劉繼文、張文熙、許孚遠、童元鎮、金學曾等人都有過此構想或嘗試，只不過在因緣際會下付諸流水。現在看來，高奏凱歌的「渡海之戰」彷彿「讀書人做了二千年的夢」，而也只有《野叟曝言》的世界裡，才終於實踐這場幻夢——小說既是虛構，卻也流露出向真實靠攏的一面。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明·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明·朱元璋撰述，《明朝開國文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66，原國立北平圖書館藏本。
- 明·鄭若曾撰，李致忠點校，《籌海圖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 明·嚴從簡著，余思黎點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2000。
- 明·吳亮輯，《萬曆疏鈔》，《續修四庫全書》史部·詔令奏議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刻本。
- 明·沈德符撰，楊萬里校點，《萬曆野獲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 明·陳子龍等編，《皇明經世文編》，臺北：國風出版社，1964，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明崇禎間平露堂刊本。
- 清·谷應泰撰，《明史紀事本末》，臺北：華世出版社，1976。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 清·盛楓輯，《嘉禾徵獻錄》，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五編清代稿鈔本，2013，中山大學圖書館藏鈔本。
- 清·夏敬渠著，黃坤校注，《野叟曝言》，臺北：三民書局，2005。
- 黃彰健校勘，《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1 年刊本縮編。

黃彰健校勘，《明神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據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 51 年刊本縮編。

(日)末松保和編纂，《宣祖實錄》，東京：學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0。

(日)伊藤松著，杉山二郎解說，《鄰交徵書》，東京：國書刊行會，1975。

二、近人論著

(日)山根幸夫著，邱明譯 1992 〈明代倭寇問題研究〉，《黃淮學刊(社會科學版)》1(1992): 78-82+116。

(日)中村榮孝 1970 《日鮮關係史の研究》中冊，東京：吉川弘文館。

王瓊玲 1986 「野叟曝言研究」，臺北：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瓊玲 1997 《清代四大才學小說》，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王瓊玲 2005 《夏敬渠與野叟曝言考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王瓊玲 2005 《野叟曝言作者夏敬渠年譜》，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日)田中健夫著，楊翰球譯，隋玉林校 1987 《倭寇—海上歷史》，武昌：武漢大學出版社。

石弘毅 2007 「清代康熙年間治臺策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日)石原道博 1954 〈日明交渉の開始と不征国日本の成立—明代の日本觀(一)〉，《茨城大學文理學部紀要(人文科學)》4(1954.3): 20-35。

安藝舟 2015 〈十五「不征之國」新論—兼談明太祖的地緣政治理念〉，《東南亞研究》5(2015): 98-105。

孟 森 1986 《明清史論著集刊續編》，北京：中華書局。

(日)岩井茂樹 2005 〈明代中国の礼制霸權主義と東アジアの秩序〉，《東洋文化》85(2005.3): 121-160。

林 琳 2004 「論清代通俗小說中的日本人形象及其發展演變」，杭州：浙江大學日語語言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日)青木正兒 1988 《江南春》，東京：平凡社。

(韓)崔官著，金錦善、魏大海譯 2013 《壬辰倭亂—四百年前的朝鮮戰爭》，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張哲俊 2005 《中國古代文學中的日本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黃仁宇 2009 《萬曆十五年》，北京：三聯書店。

楊旺生 2000 〈論《野叟曝言》「托於有明」的敘事謀略〉《東方論壇》2001.1: 80-85。

楊旺生 2004 〈論《野叟曝言》的封建理想主義色彩〉，《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

會科學版)》4.4(2004.12): 89-93。

- 楊娟娟 2011 「夏敬渠《野叟曝言》研究」，贛州：贛南師範學院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樑生 1985 《明代中日關係研究—以明史日本傳所見幾個問題為中心》，臺北：文史哲出版社。
- 鄭潔西 2010 〈16世紀末明朝的征討日本戰略及其變遷—以萬曆朝鮮之役的詔令資料為中心〉，《明史研究論叢》8(2010): 217-228。
- 鄭潔西 2012 〈16世紀末日本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戰爭與整個亞洲世界的聯動—以萬曆二十年明朝「借兵暹羅」征討日本議案為例〉，《海洋史研究》3(2012.5): 124-140。
- 魯迅 2009 《中國小說史略》，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蕭相愷等選編 2012 《夏敬渠與屠紳研究論文選萃》，南京：鳳凰出版社。
- 錢靜方 1979 《小說叢考》，臺北：河洛圖書出版社。
- 謝君 2010 「明清小說與倭寇」，杭州：浙江工業大學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Breaking the “Nations not to be Subdued” Policy:
Humble Words of a Rustic Elder (Yesou Puyan),
Toyotomi Hideyoshi and the War which Crossed the
Ocean**

Tseng Shih-hao *

Abstract

During the High Qing, Xia Jingqu 夏敬渠 imagined a plot where the Ming army crossed the sea, took Mu Xiu 木秀 (Toyotomi Hideyoshi 豐臣秀吉) captive, and invaded the capital of Japan with relative ease in his work *Humble World of a Rustic Elder* 野叟曝言 (*Yesou puyan*). In this novel, the Japanese were ruled by a dissolute couple, Mu Xiu and Kuan Ji 寬吉 (the two characters *xiu* and *ji* when placed together become *Hideyoshi* in Kanji), who both believed in a Buddhist heresy. Hence, the war which crossed the ocean may first be considered as religious—orthodox against heretic. Secondly, the battlefield where the Ming and the Japan engaged each other shifted from the southeast coast of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which was ravaged by the Wokou 倭寇 during the Ming dynasty—to Taiwan, which was inspired by the Kangxi Emperor and Shi Lang’s 施琅 annexation of Taiwan. After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China’s territory, Japan was also regarded as an imposing garrison of East China within the novel; this plot point was related to Shi Lang’s position on Taiwan which advocated for its geographical value as a “protector.” Additionally, although the Hongwu Emperor declared that Japan was one of the “Nations not to be Subdued,” in reality both the Hongwu Emperor and the Wanli Emperor had planned to invade Japan; however, the invasion was never carried out due to a mix of foreign affairs and realistic considerations.

* Tseng Shih-hao, Ph.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ccordingly, this episode in the *Humble World of a Rustic Elder* seems to maintain a level of absurdity, but may also realized the unfulfilled dream of the Ming emperor.

Keywords: Nations not to be Subdued, *Humble Words of a Rustic Elder* 野叟曝言, *Yesou Puyan*, Toyotomi Hideyoshi, Buddhism, Taiwan